

第六章 战争结束前的内阁

内阁组成的秘诀

结束战争具有决定意义的标志，是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发表了《波茨坦公告》。铃木总理声明“不予理睬”，于是，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9日上午零点正，苏联参战。几个小时之后，又在长崎投下原子弹。这样，军事上的惨局出现了。从9日夜到10日凌晨，召开了御前会议，终于走向了天皇决断结束战争的道路。根据事态发展的过程，应该描写一下实现终战的铃木内阁活动的内幕。

铃木内阁成立于这一年的4月7日。从成立时起，就被说成是巴特里奥政权，即终战内阁。可是，正象总理在就职演说中说的“我是垫脚石”一样，在国民面前表明政策，就是制定国民义勇兵役法，准备在本土决战，把战事进行到底，一派坚决抗战到底的形势。正因为如此，突然决定结束战争，一时间让国民都呆然了。并且，一部分强硬派军人，发起反叛事件，出现了结束战争时的混乱。从这种情况分析，铃木内阁是否从一开始，就决心作为一个结束战争的内阁呢？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怀疑和注目。为了解开这个疑问和填补这块空白，有必要分析一下铃木内阁的内幕活动情况。

铃木内阁的阁僚，总理下属16人。有关这些国务大臣的选举经过，先听一听当时的内阁书记官长迫水久长的介绍吧：“铃木总理决心把这届内阁作为终战内阁，早在接受大命时，就领会了天皇的意思，而表现得很清楚了。不过，迅速走向结束战争的道路

是不容易的。老子说：‘治大国者就象煮小鱼’。就是说，煮小鱼时如果乱翻扰，就会变形，治国也是同样的道理。他特意用这种意义的语言来形容，正象他曾向我表示过的，要用高明的手段结束战争。内阁的成员也是经过选择的。

总理原来是不太关心政治的，因此，他自己决定的人选是：情报局总裁下村宏、警视总监町村金五，后来又随便想了两、三个人。因我和重臣冈田启介的关系（迫水是冈田大将的女婿），首先决定让我担任内阁的书记官长，所以，从一开始就对阁僚的人选有所接触。不过，在这一点上，是相当劳神的。陆军幸好是跟铃木总理很合得来的阿南君，一直身居陆相的职位。并且，海相米内也是和平派的海军元老，其部下也都是和平派；外相是和平派的东乡。只要确定了这些人选，剩下的就只需平衡一下了。

从基本方针出发，决定从政党中选择两个人。所谓政党也只有大日本政治会。因此，首先请冈田中颜担任厚相。冈田当时是众议院议长，当然是很有派头的；另一个从政党中选出的是樱井兵五郎，希望让他担任国务相。冈田是旧政友系，樱井是旧民政系，故而（两种势力）取得了平衡。藏相是广濑丰作，农商相是石黑忠笃，国务相兼情报局总裁是下村宏。军需相是丰田贞次郎海军大将，内相是安倍源基，运通相是小日山直登，法相是松阪广政（留任）。

如果就这样配置阁僚，还保留着两个国务相的职位，因此，需要按照惯例平衡一下，决定从陆海军中各选一人。总理是海军出身，他说：‘比如让左近司先生担任工商大臣怎样呢？’‘啊，可以’。就是这样轻而易举地通过的。左近司政三中将是总理在大正末期担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时长门号战舰的舰长，并且是海军稳健派中的一人，因此，可以说和铃木总理是一种不分彼此的关系。

陆军方面由阿南君推荐，选定了安井藤治中将。安井君和阿南君在小学校是同年级，都是班里当头的，让人觉得好象是阿南

君个人的意思。

另一个人是文相太田耕造。关于他有着这样的记载：太田君是平沼内阁的书记官长，可是，当我们的友邦德国和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时（1939年8月23日），发表著名的声明《国际形势复杂离奇》而引退了，他就是写这份声明的人。从这一事件也能明白，他是平沼君的头号人物，但是，并非是平沼建议：‘让太田入阁’，而是组阁本部指名让他入阁的。

在战前的政治中也有许多派别，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就是重臣派阀，在这种情况下，决定由冈田担任书记官长。可是，本部突然意识到，同样是重臣的平沼派，还没有人人入阁，这样的话以后的事情就不好办了。于是，改变了文相由冈田厚相兼任的打算，急忙把铃木总理的长子铃木一君，叫到平沼那里，提出：‘起用太田君，希望得到谅解’的要求。可以说，这个人事变动，并没有征求平沼君的意见。”

国力濒临枯竭

我们从阁僚的回忆中，可以看到终战时政府的内幕。

安井藤治（铃木终战内阁的国务相，陆军中将）说：“我退役是在大东亚战争开始前一个星期，即1941年12月1日，在此之前，担任外蒙第六军司令官。在那里服役两年多，1941年10月接到归国的命令，11月回国。接着去拜访东条总理（兼陆相）。那时，东条说：‘安井君，长时间来，辛苦你了。’这当然就意味着让我退役了。从大东亚战争一开始，我就认为自己不会卷入这场战争了，可是，在战争的最后时刻，却让我参加内阁，连我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可是，不管怎样，推荐我的是密友阿南君，所以我只好接受了。我和阿南君在小学校是同年级，陆军士官学校时也是同期，都是第十八期。可是，入阁不久，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就是我知道了进行战争快要把国力耗尽了。这对阿南君来说是很不

利的，不过，我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如何再也不能继续战争了。’

在我看来，阿南君在就任陆相时，好象还认为会有打胜仗的机会的，至少可以在冲绳陷落之前，在沿海给敌人以严重的打击。如果突然袭击(敌人)，即使谋求和平也能够在相当有利的条件下实现停战。可是，冲绳陷落了，战争也不象所想象的那样。因此，6月末，他不得不同意让苏联居间调停，谋求和平的建议。虽然阿南君也正在考虑和平，可是，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如果媾和，军队就会发生暴动或者反叛。怎样统一和控制军队呢？这是最让人担心的问题，并且是非常棘手的。对此，我的想法也完全相同。当然，即使是彼此在心里明白，也不会轻易说出来的。

所谓国务大臣，做什么工作呢？对此几乎没有文件说明。铃木内阁的国务相，由我和海军的左近司政三中将、政界的樱井兵五郎以及下村宏组成。下村担任的是情报局总裁的工作，剩下的三个人，是没有多少事要干的。可是，如果这样说来，樱井君是不称职的，如果跟他一说，情报反而就会泄漏出去的，因此，只好回避他。连下村在内的三个国务相，每周星期一下午，在官邸和总理喝着茶，议论国策。这说起来有点夸口，不过，总是根据季节的不同，而接受应做的工作。

如果是5月份，譬如物资没有从南方运过来，于是，就要从北方的朝鲜和满洲运来。为此，日本海港所需要的装卸设备，至少还必须提高50%。这是很难办的一件事，就把这作为国务相的工作而分担下来。左近司负责新潟以北，我负责以西。花3周左右的时间实地考察了富山、七尾、敦贺、舞鹤，境(米子)。凡是能做到的，都陆续开始着手了。可是，如果干实际工作，光靠国务相是不行的，因此，在内阁会议上，委任各大臣除司法和外务工作以外的全权。从各省厅选拔了40人左右组成的课长班，也就跟着去了，加上当地的人，一共有150人左右。不过，机关的性质是经常变动的。

在敦贺，从满洲运来的大豆，是用大口袋运来的，可是没有卸货的机器，一问什么地方有呢？据说名古屋有，就下令马上运到这里来，这时，发挥的是运输相的作用。在七尾，即使把货物从船上卸下，运货的路程有500米，也不能运送。尽管有卡车，可没有汽油，于是，命令铺设铁道；没有钢轨，只好取下备用的钢轨来铺设，这也是行使运输相的权力。没有铺设铁路的劳力，只好动员金泽的工兵队，这行使的是陆相的权力。

当时七尾，有大量的碎铁丢在野地里，无人问津，记得这很快蔓延到了大阪方面。在舞鹤，人手不够，这属于文部大臣的权限，命令京都府知事，动员京都府立医大的学生。在伏木港、富山纺织工厂出产的人造丝，堆积如山，据说是送往满洲的。可是没有船，这就无能为力了。不过，国内衣料之类也非常缺乏，让人感到不安。调查到管理这些人造丝的是大东亚省，于是，就行使大东亚大臣的权力，运送到严重缺乏的一些县里去。为了照顾脸面，给自己居住的富山县也分配了点。

到6月份，发生疏散问题时，仍然和左近司分头做，我担任了从大阪到福冈县的催促工作。国务相的工作就是这些，可是这样的工作是非常难办的。”

担心师团长的能力

安井藤治继续说：“虽是离题的话，可当时的大臣是怎样生活的呢？想在这里谈一下我个人的生活情况。我让家属疏散到了富山，现在的房子，是烧后侥幸剩下的，我一个人生活在这里。国务相要在总理官邸办公，每天都要去，大臣坐的车都烧汽油，可我想还是多少积攒一点吧，往返都乘国电到新宿，从新宿到官邸有车接送。

有一位警卫巡查部长，始终跟随着我。夜里一般在家里就寝，白天准时到官邸去上班，真不好意思说出口，目的是能在官

邸吃上午饭。开始是先喝西餐汤，接着是烧秋刀鱼。记得都是用油炸着吃，一个人生活总有些不方便，闹不好就吃不上饭，而且，还有空袭，白天又不能呆在家里，于是，经区机关介绍，请了两位失掉了房子的母女俩来住，让她做做饭，每晚几乎都是吃二个红薯和煮大豆，体重迅速下降。

当我说：‘我拿钱，不能给我作点更好吃的东西吗？’她曾经到浦和这个地方，买来了很多南瓜，吃了好几天，忘了是什么时候，石黑农相曾经把农民青年队生产的小叶菜分配给各大臣一小捆。就是连这也是很难得的。

6月11日地方总监府成立，全体总监第一次举行会晤时，首先拜谒天皇，然后回到官邸开始举行会议，但也只能喝到粗茶。总理对迫水书记官长说：‘不能拿出点好茶吗？’‘没有砂糖什么的？’如果大臣都饿着肚子，喝着粗茶举行总监会议，那真是已经实在没什么办法了。谁的心中都明白，战争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可是，阿南君代表着强烈要求本土决战的陆军，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正因为如此，就非常需要和我这个陆军同行商量各种事情。

在这里谈一件小事。5月25日的空袭中，东京遭到严重损失，在内阁会议上曾严厉指责：‘陆军究竟在干什么’。阿南君回答：‘要妥善处理。’后来他向我说明了妥善处理这一不得要领之词的含义：‘在东京，能集中起来的防空武器，都已经完全拿出来了，若再想加强防空能力，只有努力训练和提高士气。因为不能做这样的回答，所以，只好回答妥善处理，实际上是很难办的。’

不知是什么时候，阿南君视察南九州第一线师长的能力，简直一落千丈，即使让他们准备本土决战，也根本不会象你想象的那样。于是，直接下了很多命令。不过，这关连到统帅权。我回答说：‘的确，用兵是参谋长的事情，可是，陆军大臣要对战争负全部责任。因为考虑到了武器以外的事情，因此，这样回答就可以了。’从这样一个小小的事情上，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阿南君好

象有一种孤独感。”

入阁之后了解到的内情

下面是铃木内阁的大臣文相太田耕造的回忆：“我好象在某个时候，跟铃木总理见过面。也只是见面打个招呼的关系。从铃木那里来人说，请我到他的私邸去。我清楚地记得，是铃木内阁开始组阁工作的第二天（1945年4月7日下午10点30分就任典礼）。起初，不知内情，根本没想到是在谈入阁的事，所以，也就没放在心上，弃而不管了。平沼骐一郎给我来了电话：‘刚才，铃木君的长子一君，到我家里来了，希望你担任这届内阁的文相。’‘先生，怎么想的呢？’，‘根据你的意向来决定。’

不一会，铃木一君乘车来了。对我说：‘想请你担任文相’。其内幕我一点都不知道，可是，不管怎样，在一君的催促下，来到了铃木在小石川的家里。一见面，铃木君就说让我担任文相。我是律师，不懂文教行政之类的事情，如果是法相，还会答应的。正当我不太愿意接受时，贯太郎挥手说：‘好了，好了。’他的气质有一种使人不能完全断然拒绝的感召力。于是，我说：‘如果这样，请问一下战争发展到这种地步，你对将来有何打算呢？社会上传说你的内阁是巴特里奥内阁，真的有停止战争的想法吗？如果把战争进行到底，我就参加这个内阁，可是，若是终战内阁，我也有自己的考虑，就不参加。’于是，他说：‘什么也没决定呢。’虽然问了好几次，他还是没有清清楚楚地说明白。坦率地说，在反复问答的过程中，在铃木君一种无法表达的内在气质影响下，终于摇摆不定地答应了入阁。可是，入阁后一看，真是出乎意料。

我以‘如果战争到底，我就可以参加内阁’的条件，先与铃木君立下了君子协定，才担任文相的。可是，内阁外的情况和内阁里的情况真是有天壤之别，大相径庭。我了解到，我国几乎已经没有再进行战争的能力了。

忘记了是什么日子，曾经在官邸举办了国民义勇队使用的武器展览会。好象是军部为了让国务大臣们了解本土决战的情况而设计出来的。不过，展出的武器中，最显眼的是竹矛和弓箭，真可谓令人目瞪口呆。尽管我们有比别人宽宏一倍的气度，可是在现代战争中，还是第一次看到陈列出这样的武器。作为文相，那时也没有什么要做的工作，称得上工作的也就是动员学生，让他们到工厂去劳动。虽然7月新设了学生动员局，可那只是做事务性的工作，清河原春作担任次官，几乎都委托他办了。我在学生去劳动的工厂周围，充满激情地走着，一直走到了横须贺和甲府那里。

我曾经受到陛下的召见，就文教行政作了各方面的汇报，记得是在5月25日的空袭中，我的房子被烧毁之前。那时，陛下大致听了我的汇报后，说道：‘现在的政策，都是应急办法，而没有根本解决问题的对策。’当时，我认为陛下不只是指文部行政，问询的口气也并不是责备，而是问应该怎么办呢！神态非常忧愁。全国各地的城市被轰炸得破烂不堪。当我穷于应付时，陛下一直目视前方。在那样的眼神下，我这个做文相的心情，真是无地自容，若有洞穴，非钻下去不可。”

可怜的国民

内相安倍源基说：虽然当初拒绝了，可是，往年的内务省是我国行政的中枢，只有内务大臣是官吏中的精华，战前和战争中的日本，因此也被视为“警察国家”。就是在临近终战期间，在陆海军的压力下，即使处于“宪兵政治”中，内务大臣仍然照常起作用。

“我长期在内务省的特高警察机关，进入企划院，担任该院的次长，一直到1943年的秋天，后来就失去了职位。记得是铃木内阁成立时，大概是4月6日或7日，报社的人来到我家，硬把

我拉上车，带到了小石川。丸山町铃木的私宅里，当时，有铃木和迫水君。

铃木先说：‘想让你担任内务大臣。’我拒绝说：‘我今年才51岁，资格不够，内务省有很多的老前辈，所以……不过，如果一定让我担任，那么，答应我两点要求就可以。’我提出了条件：

第一，战争要有始有终。战争已进入困难阶段，这届内阁是否要把战争进行到底呢？于是，铃木君斩钉截铁地说：‘当然要战斗下去。’

第二，如果我担任大臣，我想以地方长官为首，在相当范围内调整人事，能任凭我行动吗？铃木回答道：‘可以。’

于是，我接受了担任内务大臣的任职。我失去职位，是因为1943年秋天，企划院和商工省联合改组成军需省。虽然因以前在企划院的关系，不了解最新的情报，可是也模模糊糊地知道，1942年中途岛海战失败以来，从南方运输物资的能力一落千丈。因物资的缺乏，继续进行战争是很困难的。因此，我当然首先要问一问，这届内阁是继续战争，还是走向和平。作为我自己，走哪一条道路都无所谓，并不取决于我个人的意见。虽然照例设置了体制，但是，想判断一下铃木的倾向，所以才先探明他的意向。他仍然回答继续战争，这是我意料之中的。

入阁之后，想为继续战争做些积极的工作。可是，由于以前的方针就是进行战争，所以，客观上决定了只能是步其后尘。首先调整了人事，变动范围涉及二十多个县、几百人之多，这是罕见的大规模人事变动。接着，开始设立了从小矶内阁就悬而未决的地方总监府制度。这是在战况恶化，交通中断，中央的命令不能传达到地方的情况下，为应付紧急事变而做的准备工作。决定把全国分成八个部分，在各地分别设立地方总监，作为领导机构。还有国民义勇队问题，这是为准备本土决战而进行的‘彻底性动员’。因为即使降低征兵年龄，也不起多大作用，所以，从长远的意义上，取消了原来的国民总动员组织——大政翼赞会，而改

成国民义勇队。可是，由谁来担任司令呢？在哪里办公呢？在这一问题上，内务省和内阁的意见产生分歧，为此，甚至传说要撤换我。

可是，这个国民义勇队还未来得及落实，战争就结束了。此外，内务省的工作还很多，不过，在重要的治安问题上，国民每天都遭到空袭，由于饥饿，多少还有些经济违法行为，可是，一般犯罪却很少，也没有大规模的反战运动，这是以前所没有想到的，可以看到全体国民的上下统一。在我看来，若真的进行本土决战，国民就会全体参战。因此，内务省的主要工作，就是防御空袭和疏散居民，以及强迫疏散房产等。即使这样，空袭造成的灾难还是与日俱增。每当参见天皇，报告受灾情况时，陛下总是表情沉痛地说：‘国民可怜啊！’对此，我总有一种心如刀绞的感受。”

扮演主角的内务官僚

“如果说到终战史，总是以海陆军的活动为中心。可是，只这样考虑，离现实就相差甚远了。虽然，那时我国确实处在军部和其‘宪兵政治’高压下，但是，也并非没有其它的势力，那就是官吏。这些官吏中的优秀分子就是内务官僚。如果再进一步说明，以前的内务省、简单说来大概是现在的自治省、建设省、厚生省、劳动省、警察厅、消防厅、公安调查厅，把各都道府县融为一体。内务大臣通过这强大的行政机构，进行治安和地方行政管理。就是说，甚至控制着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随着战争的激化，主角始终由陆海军的军人扮演。可是，为了维持战争形势下的治安和统制经济，军部如果不能保证内务省官僚的合作，进行战争也是不可能的。可以说，是军部和内务官僚内外配合地指挥着战争。

可是，战争形势日趋不利，为了不使国家彻底崩溃，只有内务大臣具有维持治安和秩序的力量。在战争结束的阶段，内务大臣扶摇直上，可以说是当仁不让。”

町村金五(铃木终战内阁的警视总监)说：“铃木内阁成立时，我是新潟县知事，内大臣木户幸一来电话通知我：‘速来东京。’于是，我于3月下旬或是4月上旬进京，马上到木户内府那里去了(根据木户日记，写着‘4月4日下午2点半，町村、新潟县知事来室面谈’，这是铃木内阁成立的前三天)。

木户对我说：‘这次决定解散小矶内阁，天皇任命铃木君组阁。因此，我问铃木君：先让谁担任书记官长？他说：还没有人选。如果这样，就难办了。难道没有合适的人选吗？我再三追问。于是，他说：如果非要我说，那就是町村。我回答说：这样不是很好吗，情况就是这样，你担任书记官长吧！’我马上坚决辞让：‘我不行，胜任不了书记官长这样的职责，我想还是不担任的好。’木户说：‘这届内阁实际上是想结束战争。’这对我说，担子就更重了。最后，他和铃木总理商量，按照重臣冈田启介的指点，由迫水担任书记官长，我担任警视总监。

任命我担任总监是从木户那里回来，又过了一两天之后的事情。算上我，在铃木总理周围聚集的都是心腹之人。我想，也许召集够了，可是，不能不说我也是其中的一人，我以为那是自己在终战时的幸运。

所以说我和他们是‘知心人的关系’，是因为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时，迫水君是冈田总理的秘书官，我是汤浅仓平宫内大臣的秘书官，木户那时是宫内省宗秩寮总裁兼内大臣秘书官长。在宫内省的时代，和木户关系就很密切，木户担任平沼内阁大臣时，我是人事课长兼内相秘书官。铃木担任侍从长，所以，我们彼此都互相有些关照，我们就是这样的关系。

我接到警视总监的任命证书是4月9日。就任之后，向各方面都要打个招呼，我再次到木户那里去拜访。我清楚地记得，那时，他反复强调：‘必须尽快结束战争，实现和平。’木户对我很是厚爱，即使进他的房间不敲门都可以，所以，才跟我说出这样重要的话。木户比铃木总理接触陛下的机会更多，所以，可以认

为这也是陛下的意思。”

试探军方的动向

町村金五继续说道：“那时的警视总监，比现在更需要通晓政治形势，否则，就不可能开展工作。在这一方面，官房主事丹羽乔四郎，警务部长增原惠吉君，特高部长上村健太郎君，经过很大努力，从各方面为我收集情报。并且，在阁僚中，国务相左近司中将特意地告诉我许多有关内阁活动的情报。虽然，我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可是，在我的印象里，认为在内阁大臣中，他不是铃木君最得力的骨干吗？也许是因为我与铃木总理关系密切的缘故吧！为了掌握情况，我经常到迫水君那里去，他也常来。当然是谈如何促成总理实现终战。可是我记得，为实现终战而采取的具体行动，在内务省内部引起骚乱是在《波茨坦公告》发表之后。

铃木君无视这个公告，原子弹在广岛降落，苏联参战，形势急转直下。在这当中，我最吃惊的是苏联参战。由于最初没有得到原子弹的明确情报，所以，不过认为它比一般的炸弹威力大点而已，并没有引起多么大的震动，只是渐渐才知道了它的厉害。然而，在听说苏联参战的一瞬间，便意识到应该下最后决心了，一个美国就能够打败我们，况且苏联参加进来，就更不成问题了。在大清早，我就赶到总理官邸，碰上了迫水君，记得是在大门口站着谈话。

我说：‘这样一来，就不得不接受《波茨坦公告》了。’迫水君也很干脆地说：‘已经是时候了，向总理提出建议，这样一来，就要说服总理。’我觉得他也越来越认真地对待现实。

如果实现终战，内务省——将作为管理首都的警视厅，最应该担心的是‘治安’。治安中最令人忧虑的是军队的叛乱。并且，面对拥有大炮和坦克的军队，警察也是无可奈何的。问题的关键涉及到陆军首脑是否赞成我们控制那些少壮将校。因此，我动员

保安课、特高课的人，确保与阿南大臣、吉积军务长、军事、军务课长，以及他们的下属的少壮幕僚的紧密联系。从这些人手中收集军队的动向和情报。后来，我也知道了发动政变的椎崎、畑中等将校的名字。也许他们是在非常冲动的情况下和同伴们一起发动的。一旦知道了，无论能否对付得了，都要采取把事态控制在最小限度的对策。”

向国民如实传达

“国务大臣，情报局总裁下村宏，在战后写了《终战记》。我们都知道他在铃木内阁起到了情报局总裁的作用。在这里把这本书没有的部分，用他亲信的话补充出来，看一下终战时，铃木内阁活动的一部分情况。那时，下村宏总裁最亲信的人是食宿都在一起的秘书官川本正信(后来是体育评论家)。据说他跟铃木总理只见过两次面，尽管如此，组阁时，铃木总理唯一自己选定的大臣就是下村，从一开始就点名要情报局总裁。如果非要究其原因，是因为在二·二六事件中，铃木和下村都程度不同地遭到叛乱军的袭击。下村虽然入阁是在二·二六事件之后的广田内阁，可是，他和任外相的吉田茂都遭到军方的攻击，说他们是自己主义者，因而，他们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铃木内阁成立时，就已经被说成是‘巴特里奥内阁’。这次邀请曾经被军方攻击的情报局总裁下村入阁，更加强了社会上认为这届内阁是终战内阁的印象。据说，下村在决定入阁时，曾明确提醒铃木总理。‘本来，我自己靠奖金苟延残年，老态龙钟的我已不胜任象情报局总裁这样繁重的工作了，实际的工作都要委托给次长。我昼夜都在总理官邸，希望能帮助总理为实现终战尽微薄之力。’下村所写和所说涉及到的，若不是处于总裁的地位，是做不到的。‘时局已改变了，我今后写和说都应该谨慎才是。不过，只是情报要真实地报道，加强国民对时局的正确认识，希望

所有报纸都按各自的特点写出来。向总理提出这些意见时，得到了承诺，所以就入阁了。’

这件事，我也曾听说过几次，并且也写在《终战记》里。铃木内阁开始成立，早在4月14日，在公布明治神宫被烧毁时，也公布了空袭受灾状况的数字，和被炸毁的主要建筑物名称。于是，下村从一开始就明确了铃木内阁的使命。正因为如此，这对做工作很不利。尽管这是后话，可是，在《波茨坦公告》发表时，铃木总理声明‘不予理睬。’情况非常严重，我仍确信那绝不是铃木的本意，而是认为结束战争迫在眉睫。”

建议天皇发表广播讲话

继续听川本信正讲：“情报局成立时，是在濠边的帝剧里办公。后来，迁移到三宅坂的参谋本部，因为被炸毁了，所以，租用内务省大楼（现在建设省）的四、五层。那时，我虽然并不知道上述情况，可已在铃木内阁的内务省了。下村总裁几乎不到这个机关来，而是在总理官邸附近的大臣官邸工作。这个总裁官邸也于5月25日在空袭中被烧了。后来，总裁暂时住在赤坂新坂町的职员宿舍。接着，在纪尾井町，现在的‘文艺春秋’附近，借了一位名叫河相达夫驻澳大利亚公使的房子，作为‘临时的官邸’，在那里一直生活到终战。总裁的夫人住在田园调布的私宅。我也让家属疏散走了，于是，我们俩都没有了负担，共同生活在官邸里，我和总裁当然是一起食宿。在官邸有一个给我们做饭的老太太，倒霉的是，加豆的黑米饭就算是最好吃的了。不知什么时候，分配了油，给我们做了象是素炸甘薯的饭，可油是臭的，总裁只吃了一口就呕吐起来。连大臣分配也没有特别照顾，和市民吃的一样。

不久，到了7月末，《波茨坦公告》发表了，总理对此‘不予理睬’；另一方面，陆陆续续，时而有人说：要特派近卫君到苏

联去，形势突然紧张起来。

8月1日早上，我和总裁两个人正在官邸吃饭，久富次长突然来了，他以‘呀，早上好’的口气开始说话。久富君一派非常认真的神态，开口第一句就是‘到了必须想办法的时候了。’

按道理说，我这个秘书官应该退席，可是，因我们三人是朋友的关系，所以，我一言不发地在旁边听着他们二人的全部谈话。我马上明白了，久富君说的‘想办法’是‘必须结束战争’的意思。久富君把各方面的情报加以综合判断，最后来进言，总裁必须挺身而出，付诸行动。

关键的是作为情报局总裁，怎样行动才好呢？久富君说：‘为了结束战争，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请陛下亲自站在麦克风前广播，即陛下亲自向国民宣布结束战争，这即使从日本的国家方针来说，不也是最好的方法吗？’

的确，如果结束战争，也许一部分军队会强烈抵抗，会发生什么事件？说不定会暴动或政变，把铃木内阁一脚踏平。因此，如果决定终战，刻不容缓，希望请陛下发表广播，只有陛下的威力才能控制这一切。下村总裁对久富君的建议，马上回答说：‘这很好，就这样办吧！’‘好，广播的事，我直接去面见陛下，请他出驾’。总裁又斩钉截铁地说。于是，久富说：‘那么，我也去做各种准备工作，’说完就回去了。当然，久富君会秘密地马上和NHK取得联系。不过，在社会上也有人认为，8月15日的天皇广播，是在那前一天的晚上，政府突然命令NHK做准备的。然而，实际上从8月1日就开始做准备了。

下村总裁直接面见陛下，请求广播的工作安排，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说实在的，下村就任国务大臣以来，虽也几次‘晋谒天皇’，可是，说到‘拜谒’，只在就任典礼时，和其他的大臣一起进行过一次。这些大臣中，能和陛下单独见面，是就职四个月来，从未有过的。当时，连陛下和大臣也处于这样的隔离状态。久富君对我说：‘安排第一次拜谒吧！’一般地，大臣请求拜谒时，要通

过内阁的总务课，跟宫内省联系。幸运的是，总务课长佐藤朝生君和我在府立一中时（现在的日比谷高中）是同班，我们是朋友。我记得总裁和次长谈到这件事是第二天的8月2日，我马上去拜托佐藤君。佐藤君说：‘这也许很难，因为军方太神经过敏，讨厌他们一一地追问谁拜谒了，就尽量不让会见陛下，不过，尽量试试看。可是，即使拜谒时间也不能超过30分钟，必须为我严守这一点，如果不这样的话，过后，军方就会到处查问陛下说了什么，令人讨厌得不得了。’

我每天都到佐藤君那里去催促‘还没有办成吗？’在焦急的等待过程中，8月6日，广岛原子弹爆炸。第三天的8日早上，总务课长佐藤君来说：‘请今天去拜谒’——这让我吃了一惊，因为这次请求拜谒之后，过了仅一周就实现了。”

禀告了两个小时

“8日，是所说的诏书推戴日，总裁有二、三件例行的公务，所以，我一个人先去总理官邸，和总务课长佐藤君碰了头。那时，佐藤君再次叮咛：‘拜谒时间，必须在三十分钟内结束，请转告总裁，因他是个说起话来总是没完没了的人……。’

下午2点之前，我同总裁一起前往皇城，这是第一次到这里来。我们从坂下门进去，先到宫内省，在那里换乘宫内省的车，在有很多树木的地方转来转去的，不知这是走向哪里，在一个建筑物前停下了。这里是文库，记得是一个侍从出来迎接，把我们带到里边，让我到一个好象是休息室的地方，只总裁一个人到那里边去了。我和总裁穿的都是国民服。虽然约定了30分钟，可是，等了许久，下村也没出来，一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半小时过去了，他还不出来。我吸着烟，等待，可烟都抽完了，他还没有出来。

因为是在宫中，我认为应该严格遵守时间才是，渐渐不安起来。皇宫里除了蝉的鸣叫外，一点声音都没有，心中不免胆怯起

来。大约过了二个小时，下村终于出来了，他满面红光，迈着未曾有过的阔步，精神抖擞地走了出来。看着他那兴奋的样子，马上就知道了发生了什么事。上车之后，他好象忘记了旁边我的存在，紧闭着嘴一言不发。他表情严肃，好象随便乱说什么就会大遭喝斥似的。

回到宫内省，在这里换上总裁的车，向大街急驰而去。这时，下村君突然把身体紧紧地靠近我，好象要抱住我似的，把嘴放在我耳边，小声而略带颤抖地说：‘陛下同意了，我向陛下建议请站在麦克风前时，陛下说如果有必要，什么时候都可以站在麦克风前。’

总裁的眼里含着淡淡的泪水，好象半哭似的。车子没有按原路回情报局或总理官邸，而是一直开到纪尾井町的临时官邸。车子一到，总裁就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开始写什么。下村在战后写的《终战记》中相当详细地写了这天拜谒的情况，在这里应该采用他的记录，因此，就不是一问一答的形式了。”

概括《终战记》有关这次“拜谒记录”的内容，请听一下下村总裁自己是怎么说的吧！

“禀告的主要内容，都是陈述世人众所周知的情报。因此，其要点对于众人来说，也是都能够讲明的，虽然太激动，曾两次忘了该说什么。因为内心痛苦，甚至眼里充满了泪水都没感觉出来。

据说，一般地拜谒时间都是20分钟，可是，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了，所以，应该退下了，就想站起来出去。可是，陛下就我禀告的具体事情，不断地让警卫给我提出问题。对于陛下再三的提问，我每次都是谨慎回答；并且，陛下对太平洋战斗、缅甸战斗的赐言，也都牢记心中。陛下还教导，要赏罚分明，君臣亲如一家。我再次深受感动，不知不觉又过了一个小时，最后，陛下说请做为参考。在我的一生中，这次受到的感动是说什么也无法比喻的。”

下村情报局总裁拜谒的第二天，9日深夜，举行了第一次御

前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与陛下就结束战争下的命令，有很大的直接联系，这种说法显然有点过火。可是，这次拜谒的前一天深夜到9日上午零点苏联参战以后，皇宫中顿时一片慌乱。接着，参见拜谒的总理以下的军、政高级官员的汇报，都停留在对形势的事务性报告上。如果认为他们都没有慢慢禀告的充足时间，那么，下村总裁在涉及很广的范围内，并且，用了二个小时直言不讳地对当前形势进行报告。可以说，确实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下面从《终战记》中，继续引用禀告内容的要点来证明其作用。

国民等待“天皇的号令”

“东条内阁以来，重臣会议多次进行。因为时至今日，仍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被简单地称为重臣恳谈会。对此，社会上有两种非难，一种认为，他们是导致今天这种局面的责任者，他们对于内阁的施政方针，说三道四，实在不象话；另一种截然相反的非难是，假如他们真的能称得上重臣，那么，在这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还若无其事，就不合适了。如果让重臣来说，我们都被当作局外人，只是在事后，领到战况报告，若主动提出问题，那因是统帅的事情，也不能请他们回答。在报纸上大写特写重臣会议等，可以说迷惑了許多人。

虽然需要召开会议，可是，如果不是两个人谈论，往往不说真话，特别是把原来的前首相都列在重臣之中。所以，当想要从批评过去的施政方针中，研究出现在及未来的道路时，把以前在政策上有过失误的人作为靶子，往往难以直言不讳地申述意见。

并且，当首相的人，未必都是出类拔萃的优秀人物。因此，即使在宫中，与其召开重臣会议，毋宁一一引见重臣。当然，也需要招揽不是原首相的人材。况且，最近君臣之中有很多礼仪，人情味反而淡漠了。

最近一个时期散布的流言蜚语说，天皇要转移到山梨、长野

那里去。在战争初期，我自己也曾极力主张大本营南进，这是因为陆海军在狭窄的土地上朝夕相处，想把二者协调行动，实现一元化领导。甚至发达的通讯工具，在广岛和东京情况就不一样，并且，没有比东京设备更好的地方了。如果抛弃东京，只能增加不便，转移大本营，如果东京被敌人占领，那是没办法的事。暂且不论，现在也已经来不及了，只能丧失国民的士气。

面对今日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局面，现在只有君臣团结，更加紧密地联合起来，别无他途。可是，最近风闻，就连天皇去到战争受灾地本所深川的御仪，也有许多反对的意见。并且，我希望在纪元2600年典礼的会场，尽快安上麦克风，通过电波让一亿国民听到天皇的声音，可是被断然拒绝了。我当时在广播协会担任会长，在这严峻的形势下，曾决心在帝国会议的开幕式上通过麦克风把天皇的声音播给全体国民。可是这也没有被重视起来。

这样，在一切事情上，天皇和国民之间被严重隔离开了。可是面对日本帝国生死存亡的多事之秋，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各地要都能听到‘天皇的命令’，这可能意味着饥不择食。然而，不管怎样，这表达了一亿国民希望亲自聆听天皇决断的心情。

最后，铃木内阁和以前的历届内阁都不同，总理一面声称不精通政治，讨厌政治；另一方面，阁僚都团结一致，确保统制，努力实现总理想做的事。在议会的答辩会上，辩白也被驳倒了，并且出现了要撤换一部分阁僚的主张。可是，在内阁会议上，总理不认为那是简单的小事。

虽然，战争从一开始就应该胜利，可是，当预料到战争的前途，没有胜利的希望时，应该考虑采取怎样的措施，保存日本民族的生存。”

这次，下村拜谒时，比前段时间总理参见时，更能直言不讳的陈述一切，陛下等待的也是这些。故而，尽管是不顾礼仪的禀告，其内容和总理的主张相抵触，若推托责任也是办不到的，一切都是下村个人的想法。措词、禀告都没有拘于礼节；当罪该万

死，在惶恐中，结束了拜谒。

附上川本信正的话：“禀告的内容是当时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能说出来的。只是在具体事情上，如天皇发布命令，一旦有事时，请陛下站在麦克风前讲话，这些得到承诺，是最令人激动的。”